

洛陽伽藍記的作者與成書年代

詹秀惠撰

前言

洛陽伽藍記（以下簡稱伽藍記）是在公曆第六世紀，產生於南北朝的一部著作。它和世說新語、水經注、顏氏家訓合為南北朝文學四大巨著，而在二十世紀末期的現代，後三部早已名播中外，家喻戶曉，伽藍記卻依然深藏寶庫，少為所知。

伽藍記的書名，歷代著錄中，唯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九、唐釋道宣大唐內典錄四作「雒陽地伽藍記」，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傳記篇作「洛陽地伽藍記」，其他如隋書經籍志、唐釋道宣廣弘明集、舊唐書經籍志、四庫提要等，均作「洛陽伽藍記」^①，和今流傳板本相同。

在學術的歸類上，歷代著錄大多錄屬史部地理類^②，少數歸入子部道家類、釋家類^③。換句話說，也就是認為它是史學和哲學上的書籍，但是依我們現代的眼光看來，它不只是史哲學上最富價值的一部墳籍，也是文學上最具情趣的一部作品。

伽藍，是「僧伽藍摩」的簡稱。「僧伽藍摩」又作「僧伽羅摩」，是梵文 *saṅghaśālamā* 的音譯，簡稱為「僧伽藍」、「伽藍」。意譯為衆園，即僧衆所住的園林，為佛寺的通稱^④。

伽藍記是以北朝元（拓跋）魏洛陽城的大伽藍（大佛寺）為綱領，依城內、城東、城南、城西、城北為次第，記載每一佛寺的造寺源流、地理位置、寺院景觀及附近坊里的風土人情，兼述當代人物的活動、政治的變亂、神靈故事、鬼怪傳聞、歷史掌故

等。卷五尤其特別敘述元魏明帝時宋雲、惠生前往西域的取經記。由伽藍記中不僅可以了解元魏一朝的史事和當時東西交通的情況及當代人民的生活狀態，是史學上不可多得的資料；而且又可以由文中看出當代人民的思想、民俗精神，及佛教盛行情況、禪宗思想漸趨發展的脈絡，是哲學上極有價值的文獻。

除此之外，伽藍記尤其難得的是它的文學氣質。作者以駢文為主、散文為輔，用華麗雋永的文句、活潑細膩的手法，來敘事寫景，是最優異的遊記文學。他用寫實的筆調，敘述一些在亂離社會中，生死幽隔、悲歡離合的故事，加上頗富神秘性的神靈鬼怪的傳聞，都具有小說的本色，在整個中國小說發展史上佔據著相當重要的地位。

本篇論文主要在探討這部名著的作者及成書年代。

甲、作者

一、姓名

今存伽藍記最古最佳的板本是如隱堂本，作者題曰：「魏撫軍府司馬楊銜之撰」。銜之生平不見於史傳，生卒年不詳。^①歷代墳籍論及銜之的，也是寥寥可數。伽藍記中銜之略有自述，成為今存了解銜之最可靠最直捷的第一手資料。

伽藍記中作者自稱「銜之」，如：

「銜之曰：昔光武受命，冰橋宜於潯水；……」（卷二頁上）^②

「銜之按：劉澄之山川古今記、戴延之西征記並云太康元年造，此則失之遠矣。……」（卷二頁下）

歷代著錄也都稱「銜之」，「銜之」為作者的名字，絕無可疑。

書中又自稱「楊銜之」：

「楊銜之云：崇善之家必有餘慶，積穢之門，殃所畢集。……」（卷四頁四）

歷代著錄也多稱姓楊，然而自唐宋即有姓羊及陽兩種歧異。唐劉知幾史道補注篇、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都稱「羊銜之」；

宋修新唐書藝文志卻說是「陽銜之」。「羊」大概是同音的誤寫；而陽除同音形近外，又因涉下「洛陽伽藍記」，「陽」字而訛。應以「楊」爲正，即作者是「楊銜之」。

二、籍貫

銜之的籍貫是那裏呢？在伽藍記中，只知道他是個道地的北方人，而且相當自尊自重，輕視江左齊梁。如云：

「歸正里，民間號爲吳人坊。南來投化者，多居其內。……景仁居此以爲恥，遂徙居孝義里。時朝廷方欲招懷荒服，待吳兒甚厚。」（卷二頁十九）

卷二又借楊元愐痛責歸化北魏的蕭衍（梁武帝）主書陳慶之以江左爲正朔的說法，大肆攻訐江左吳人食衣住行、音辭德行之鄙陋卑賤。（詳見卷二頁十九）

銜之屢以江左爲僞，稱僞齊，如：

「景明初，僞齊建安王蕭寶寅來降，封會稽公，爲築宅於歸正里。」（卷三頁九）

直叫蕭衍姓名，不稱帝號，如：

「後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歸降……」（卷三頁九）

銜之是生長在北方的漢人，絕無可疑，但到底是中原那個地方的人氏，伽藍記沒有明白的提示。唐釋道宣廣弘明集說他是北平人。②

按：魏書卷一百六上地形志：

「北平郡，孝昌中分中山置，治北平城。」

元魏孝明帝孝昌年間，分出中山郡的一部分，設置北平郡，郡治北平城，即在今直隸縣完縣東。

因此，果眞如廣弘明集所說，銜之的籍貫是後魏時的中原北平郡人。

三、行狀

至於銜之一生的行狀，在文獻中也是鳳毛麟角，只能略窺一二。

伽藍記中有三節文字，銜之述及自身的行事，卷一說：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裝飾畢功，明帝與胡太后共登之。視宮內如掌中，臨京師若家庭，以其見宮中，禁人不聽升。銜之嘗與胡孝世共登之，下臨雲雨，信哉不虛！」（頁一）

在這一節文字中，銜之自述他和胡孝世共登永寧寺舉高九十丈，連剎高一千尺的九層浮圖。

關於永寧寺立寺及九層浮圖被焚毀的年月，伽藍記都有明確的記載，永寧寺是在元魏孝明帝熙平元年（即梁武帝天監十五年，公曆五一六年）創建的，浮圖也在這時候興造。至元魏孝武帝永熙三年二月（即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公曆五三四年）浮圖被火燒毀^①，前後共十九年，銜之和胡孝世登塔年歲，就在這十九年間。極可能是在熙平元年以後，武泰元年（即梁武帝大通二年，公曆五二八年）胡太后及幼主劉劼被爾朱榮沈于河以前。

在伽藍記中銜之自述與胡孝世登塔之後，接着有一節文句提及當時達摩禪師雲遊永寧寺、贊美寺觀的情形，說：

「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遊中土，見金盤炫目，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讚歎，實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麗，閻浮所無也，極物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無，合掌連日。」（卷一頁五）

很顯然的，銜之肯定的記載這位被公認爲中國禪宗初祖的達摩禪師，曾經遊歷永寧寺，而且在自述登塔後，用「時有」二字，似乎銜之曾在雲遊浮圖時，親自會見過達摩。本來我們可由達摩的至魏及圓寂之年，反求銜之登塔的較近的年歲，但可惜的是達摩抵華、至魏及寂滅歲月，諸多傳說，紛歧不一，很難取信。最早寫成達摩傳的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又只說他「初達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遊化爲務，不測於終」（卷十九），沒有確定年歲記載，無法藉此考定銜之登塔之年。但是如依宋釋道原景德傳燈錄校語所說達摩至洛陽時爲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即梁武帝普通元年，公曆四二〇年），逝世時爲魏孝莊帝永安元年，即孝明

帝武泰元年公曆五二八，和我們推定銜之登塔之年在熙平元年至武泰元年間的說法完全符合。

就因伽藍記有銜之與達摩可能相見的記載，而續高僧傳又說：

「磨（按：即達摩）以此法（按：指壁觀、四行之法）開化魏土。識真之士，從奉歸悟，錄其言語，卷流於世。」

既然達摩開化魏土，曾有識真之士，從奉歸悟，銜之又被認為曾在永寧寺見到達摩，因此景德傳燈錄便有一段銜之和達摩問答佛乘「祖」及宗旨的對話（卷三），這又是銜之行踪的一種傳聞，未必可信，但所以有這種傳聞，和伽藍記文中的記事和思想有密切關係，涉及銜之的思想問題，請參看筆者另兩篇論文：「楊銜之與禪」、「洛陽伽藍記的思想」，不多贅述。

卷一銜之說及「苗茨碑」時又憶起了自己曾精釋「苗茨」意旨的一段往事：

「奈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明帝所立也，題云苗茨之碑。高祖於碑北作苗茨堂。永安中年莊帝馬射於華林園，百官皆來讀碑，疑苗字誤。國子博士李同軌曰：『魏明英才，世稱三公祖；幹宣其羽翼，但未知本意如何，不得言誤也。』銜之時為奉朝請，因即釋曰：『以蒿覆之，故言苗茨，何誤之有？衆咸稱善，以為得其旨歸。』（頁三〇）

在皇帝及百官之前，精解魏明帝「苗茨」碑「苗茨」之義，取自「以蒿覆之」，這是銜之極為榮耀的事，所以特別詳盡的記了下來。

元魏孝明帝武泰元年，胡太后弑帝，立幼主釗，同年爾朱榮起兵入洛陽，沉胡太后及釗于河，立長樂王子攸，是為孝莊帝，起初的年號「建義」，就在建義元年四月改元永安。永安三年孝莊帝誅爾朱榮，爾朱世隆爾朱兆破洛陽，孝莊帝被俘，縊死晉陽，永安僅有三年。銜之稱「永安中年」為奉朝請，當指永安二年（即梁武帝中大通元年，公曆五二九年）。

鮮卑拓跋魏自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即南齊武帝永明十一年，公曆四九三年）由平城遷都洛陽後，就勵行漢化，推動文治，這對長期在曠武蠻野、無禮無文的諸胡統治下的中原士族，不異是天賜甘露，絕處逢生，振奮不已。但是只短短的三十六年，孝明帝武泰元年以後，爾朱榮、爾朱世隆、爾朱兆的先後變亂，北魏元氣大傷。至孝武帝永熙三年（五三四）高歡再反叛，孝武帝奔長安，投靠宇文泰。魏分東西：宇文泰控制的是西魏；高歡入洛陽，立孝靜帝，京城從洛陽遷到鄴都，是為東魏。不論東或西魏

，帝柄旁握，魏朝已名存實亡。

洛陽城佛教的盛衰，正和北魏朝廷的治亂共消長。佛教從漢朝傳入中國後，日漸廣被，到了北魏，達於鼎盛。伽藍記中，銜之寫下它的盛況說：

「日頂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豪眉之像，夜台圓紺髮之形，爾來奔競，其風遂廣。至晉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愈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跡。於是昭提聯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撰山中之影。金利與靈台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序頁二）

這種廣立寺塔，足和宮殿齊美的狀大盛況，在銜之的彩筆下，更是有聲有色。但是，永熙兵亂，東魏捨去屢遭兵馬蹂躪的洛陽，遷都鄴城後，僧尼也隨着政治中心的轉移而遷徙，留下的是已遭破壞、乏人管修的空洞寺塔。當銜之在孝靜帝武定五年（即梁武帝大清元年，西魏文帝大統十三年，公曆五四七年），因行役，重覽洛陽，麥秀之感，黍離之悲，使他又哀傷的寫下衰頹的景況：

「際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堵破高艾，巷羅荆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遊兒牧豎，躑躅於几筵，農夫耕稼，芸黍於雙闕。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序頁二）

早期政教中心的洛陽城，那種壯麗的盛況，已如鏡花水月，只存在記憶裏了，象徵宗教生命的寺觀、廟塔也化作灰燼丘墟，都成了鳥獸及人們遊牧、芸耕的場所，興衰之異，今昔之別，怎能不令銜之油然哀歎！

正由於銜之能親睹盛衰之景，泛起黍離之悲，因此他產生了寫作伽藍記的動機：

「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寮廓，鐘磬罕聞。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然寺數最多，不可遍寫，今之所錄，止大伽藍，其中小者，取其詳世諦事，因而出之。」（序頁一）

僅洛陽一城，就有一千多寺的豪華景觀，已成史跡，銜之眼見那種「鐘磬罕聞」的寂寥景象，不禁恐慌起來，擔心「後世無

傳」，才義不容辭的爲這些伽藍撰寫傳記。借著對伽藍的憑吊，引發對故國盛衰的哀思。

銜之在序中還謙遜的說：

（序頁二）「余才非著述，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

他自謙沒有著述之才，事實上，伽藍記卻是一部偉大的創作。

依據伽藍記這些銜之的自述資料，可約略的了解銜之活動的年代，歷經元魏孝明帝（熙平至武泰年間）、幼主釗、孝莊帝、節閔帝、孝武帝，至東魏孝靜帝（武定五年以前）。

官場陞遷屢異，處在這多位帝王變遷的元魏時代，除非特殊情況，銜之不可能只在孝莊帝時，出仕過一任奉朝請而已。但伽藍記中除奉朝請一職外，卻沒有其他官銜的記錄。在序中銜之自稱「因行役，重覽洛陽」，這「行役」二字，使我們懷疑他是因公務，帶官兵前往洛陽，但到底做什麼官，就不得而知了。

如隱堂本伽藍記的作者題稱「魏撫軍府司馬楊銜之」，宋陳振孫書錄解題已如此，著錄爲「後魏撫軍司馬楊銜之」。果真如此，「撫軍府司馬」又是銜之曾出仕過的官職。

綜觀其他有關文獻，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銜之的官銜是「期城郡太守」；唐釋道宣大唐內典錄作「期城郡守」；唐釋道世法苑珠林作「元魏鄴郡期城郡守」；據此，銜之又曾做過「期城郡守」。

按：范氏洛陽伽藍記校注言「期城郡」元魏屬襄州，與鄴都不涉，珠林誤。又證銜之爲期城郡太守時當在孝靜帝元象元年（五三八）之前，即作伽藍記之先。^④

廣弘明集稱銜之「元魏末爲秘書監」，「見寺宇壯麗，損費金碧；王公相競，侵百姓」，才寫了伽藍記，目的在諷諫「不恤衆庶」。又說銜之後來會上書排佛，主旨是說釋教虛妄有爲，貪積無厭，並勸立嚴勤，來明辨佛徒真偽，使佛法可遵，逃兵還歸本役。^⑤

這又是間接資料顯示的銜之另一事蹟。

至於銜之真如釋道宣所說，是個排佛者，或如釋道原所述，是個宗奉佛乘之流，這個問題牽涉較複雜，筆者另有兩篇文章：「楊銜之與禪」、「洛陽伽藍記的思想」論及，在這裏不再細述。

乙、成書年代

由上所述，我們得知銜之在武定五年，因行役，重覽洛陽時，才產生了著作伽藍記的動機，但什麼時候才著成呢？伽藍記中雖沒有寫明著成的年歲，但由文句中卻可明確的窺探之，伽藍記著成於魏末的武定年間，決非入齊之作。

其一，伽藍記中，銜之顯以魏人自居，云：

「逮我孝昌三年，大雨類橋，柱始埋沒，道北二柱，至今猶存。」（卷一頁一）

「靈台東辟雍，是魏武所造者。至我正光中，造明堂於辟雍之西。」（卷三頁三）

「綜形貌舉止，甚似昏主。其母告之，令自方便。綜遂歸我聖闕，更改名曰讚，字世務。始爲寶卷追服三年喪。」（卷一頁二）

二

「我孝昌三年」，「我止光中」，「歸我聖闕」：「孝昌」、「正光」都是元魏孝明帝的年號；豫章王肅綜由梁入魏，除伽藍記外，正史也有明文。銜之在元魏年號前加上「我」字，稱元魏朝廷爲聖闕，前附加「我」字，用字與語氣都確認自己是魏朝的臣民。尤其用「聖闕」二字更肯定銜之著作伽藍記時決未入齊。

又云：

「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愈盛。」（序頁一）

「（楊）元愼正色曰：……我魏應靈受圖，定鼎嵩洛，五川爲鎮，四海爲家。」（卷一頁三）

「至時世隆等慶長廣而立焉。禪文曰：皇帝咨廣陵王恭。自我皇魏之有天下也，累聖開輔，重基衍業，奄有崑邦，光宅四海，故道溢百王，德漸無外。」（卷二頁十四）

「神龜中，常景爲納頰，其辭曰……魏錄仰天，玄符握鏡，聖運會昌，龍圖受命，乃捲書軌，永懷寶定。……」（卷三頁九）

以上所引四節文字中，第一節銜之自序用「皇魏受圖」，「魏」上加「皇」字，顯示銜之作序時，決在魏世，未曾入齊。第二節「我魏應錄受圖」是銜之直接引述楊元愼的說辭，第三節「自我皇魏之有天下也」是記載長廣王讓位給廣陵王禪文中的詞句，第四節「魏錄仰天」等言辭，是常景納頰的文句。雖然後三節文句都是銜之引述第二者的說辭及文節而來的，不是自我的表白，但如果銜之真的入齊後才著成伽藍記的話，相信他在擇取資料時必不會如此顯著的記載下這些「魏錄仰天」、「龍圖受命」、「道溢百代」的詞句。

其二伽藍記屢稱「偽齊」，如：

「綜字世務，偽齊昏主寶卷遺腹子也。」（卷二頁二）

「肅字公懿，琅琊人也，偽齊雍州刺史奐之子也。」（卷三頁六）

這裏的「偽齊」是指江南的蕭齊，並非是中原的高齊，但高洋篡魏，國號爲齊，若使銜之果真由魏入齊，怎敢不避齊諱，在著作上出現「偽齊」字樣？儘管這「偽齊」指向不同，但蕭齊和高齊的「齊」字形音全同，加上「偽」字，卻極易令人產生誤解。而且銜之曾爲魏臣，既已改朝換代，更須小心保全性命才是，怎敢用「偽齊」二字，有指桑罵槐，自與文字獄之嫌。由此更可肯定伽藍記成於魏末，未嘗入齊。

其三是藍伽記中的史事，只記載到武定五年，沒有入齊後事。

又卷三云：

「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於鄴。」（頁六）

按：遷石經事又見於正史，魏書卷十二孝靜帝本紀：

「（武定四年）八月，移洛陽漢魏石經於鄴。」

又隋書卷三十二經籍志：

「魏正始中，又立三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之末，神武執政，自洛陽徙于鄴都，行至河陽，值學廢，遂沒于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

合二史觀之，「武定四年，神武自洛陽遷石經於鄴」，正是伽藍記所說的：「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於鄴」。

「大將軍」，即指「北齊高祖神武皇帝高歡」。歡在魏世，受封爲柱國大將軍，天柱大將軍，所以銜之稱「大將軍」。

武定五年，高歡崩，其子北齊文宣帝高洋篡魏，即位之初的天保年間，追崇高歡爲獻武帝，廟號太祖，到了齊後主天統元年，改封爲神武皇帝，廟號高祖^①。因此，魏書稱高歡爲獻武、而北齊書，北史都稱做神武。而銜之卻仍用「大將軍」的稱呼，顯然是銜之撰寫伽藍記時，根本未入齊，所以不知道高歡有獻武等的封號；否則，身爲齊臣，銜之必不得不用帝號。

綜觀以上所說，伽藍記的著成時代當在武定五年後的元魏之末，未入齊世。武定八年（即梁簡文帝大寶元年，西魏文帝大統十六年，公曆五五〇年），高洋廢孝靜帝爲中山王，齊與魏亡。因此，伽藍記的成書年代可肯定爲東魏孝靜帝武定五年（公曆五四七）至武定八年（公曆五五〇）之間。

① 可參考荏氏洛陽伽藍記校注附編「歷代著錄及序跋題識（真正書局）」。

② 隋書、新舊唐志、四庫提要等均如此，可參考范氏校注附編二。

③ 新唐書藝文志歸入子錄道家類，鄭樵通志藝文略歸入釋家類。

④ 翻譯名義集六十四寺塔壇幢：「僧伽藍，譯爲衆園。僧史略云爲衆人廣園。園圃，生類之所，佛弟子其生類造芽聖果也。」

佛學大辭典：「伽藍，僧伽藍摩(Sanghaharama)之略，譯曰衆園，爲僧衆所住之園莊，寺院之通稱也。」又「僧伽藍摩(Sanghaharama)，又作僧伽藍摩；略曰僧伽藍、伽藍等。譯曰衆園，僧衆所住之園林也。玄應音義二曰「僧伽藍，在譯云村，此應說也。正言僧伽藍摩，此云衆園也。」

⑤ 嚴可均全北齊文場銜之小傳稱「齊天保中卒」，天保是齊文宣帝高洋篡魏後的第一個年號，共十年（公曆五五〇至五五九）。全北齊文之說不知根據什麼，恐也是推測之辭。

- ⑧ 據慈文堂書館影印四庫書本叢書。
- ⑨ 具清釋道宣撰弘明集六教列代王巨漕悉解。
- ⑩ 御監記卷一頁十二：「永熙三年二月葬國爲火所燒。」
- ⑪ 參閱汪氏省陽伽藍遺法附編一揚卷之極略。
- ⑫ 見卷六教列代王巨漕悉解。又全北齊文、釋文紀卷政右衛之上卷之文。
- ⑬ 如慈堂本作顯，各本皆作釋。石河可志，說卷六卷影，書氏校注修正作釋，見洛陽伽藍記校注。
- ⑭ 參閱北齊書、北史神武帝紀。